



瓦尔特·博斯哈德： 用鲜活影像记录“红色之都”

延安时期，由于国民党实行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，延安犹如白色海洋中的一个红色孤岛，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。其间，一批外国进步记者走进延安这座“红色之都”，用手中的笔和镜头，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。他们以敏锐的目光，客观公正地向世界报道中国革命的真相，为地处偏僻、对外宣传资源匮乏的中国共产党“发声”，将“红色孤岛”的信息和红军将士的事迹传播到世界各地，让世界了解“红色中国”，瓦尔特·博斯哈德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瓦尔特·博斯哈德（1892—1975年），瑞士人，《新苏黎世报》《生活》《世界画报》记者，现代新闻摄影的先驱。他是第一位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本人的欧洲记者，于1938年和1947年两次到延安和解放区采访，用镜头记录了当时的时代面貌和历史时刻，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，积累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闻素材。

李飞

在延安看到 中华民族的希望

1938年初，史沫特莱帮助博斯哈德在武汉的中共办事处见到周恩来，在周恩来的介绍下他顺利拜会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

主任林伯渠，经林伯渠安排，博斯哈德随八路军运输物资的车队前往延安，开始了他的延安之行。

途中，满载货物的军用卡车颠簸在泥泞的山路上，旅途的艰辛险阻令人惊心动魄。汽车不时陷入泥泞之中，不得不用人力畜力帮助拉动汽车，一些路段几乎是一寸一寸挪步前行。博斯哈德感叹：“路况之差，使得我们只好缓慢前行。即使轮子上缠着铁链，也无法阻止汽车顺着陡峭的山坡向后滑。好几次，车队还得从万丈深渊上晃晃悠悠地经过，让人直捏一把冷汗。”博斯哈德用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拍摄了沿途风光和车队行程，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三原、宜君、洛川、甘泉等陕北小镇沿街的建筑风貌和风土人情。途中人们对红军的热情给博斯哈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车队一行人曾在一间农舍中过夜，主人把最好的房间腾给他们，房间的墙上用鲜红的纸写着“我们相信红军”，这份军民鱼水情让他非常感动。

博斯哈德回忆道：沿途的乡村越来越破败，然而我们越接近红色首都，就越能看到大量中国年轻人的身影，他们个个背着简单的行李徒步走到这里，希望加入梦寐以求的八路军，这是一条“朝圣”之路，延安就是下一代心目中的“麦加圣城”。这一代人在战火中背井离

乡，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归宿。他感慨道：“共产党点燃了许多中国青年的希望，使他们纷纷涌向延安，主动接受革命教育。”虽然抗战时期的延安物质贫乏，但军民精神富足，延安以其独特的气质风采，吸引了众多进步青年如潮水般涌向延安，奔向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。

用镜头记录延安军民的生活

历经6天的艰苦旅程，博斯哈德终于抵达令他心驰神往的延安。他用摄像机镜头真实地记录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，拍摄了一部片长21分49秒、名为《延安之旅》的黑白无声纪录片，不仅记录了毛泽东走出窑洞与众人见面的实况，还记录了毛泽东工作生活场景的珍贵影像资料，同时将镜头对准了普通百姓和战士。博斯哈德拍摄了抗大、陕北公学和鲁艺学员们的学习和生活情景。他们在延河边洗漱，在院子里集体用餐，在晨光中上早操，在晚霞里散步、唱歌、打球……丰富多彩的生活，深深吸引着这位来自欧洲的访客。

博斯哈德详细真实地记录和呈现了延安风貌，有战士们光脚穿布鞋在操场上席地而坐学文化、端枪冲下山头训练的场面，也有“红小鬼”在训练间隙用书本当球拍打乒乓球、鲁艺学员在窑洞门口合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画面，还有老乡卖凉皮、泡馍的街头见闻。延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：人们居住在土窑洞内，机关、学校、医院也不例外，但街道干净整洁，大家穿着打补丁却干干净净的衣服，这里的生活看起来生机勃勃。博斯哈德发现，在共产党的根据地，人们最重视的是学习和教育，士兵们要不断学习、培养读写能力，在行军途中或者休息时，士兵们用手指头或尖尖的石子在沙土里练习写字，以完成一天的课业。红军用这种方式彻底扫除了文盲，

每个士兵都能读懂报纸和简单的书籍或小册子。这里还有许多大学高材生，说着流利的法语和英语，他们认为共产党是中国走向民族独立的希望，他们来到这里继续学业并相互交流，憧憬着民族的未来，为理想而奋斗。

毛泽东的智慧与自信让他终生难忘

在1938年访问延安期间，博斯哈德采访了毛泽东。当时，毛泽东正在写《论持久战》，话题围绕中日战争的形势和趋势展开。在毛泽东看来，日本有三大弱点：兵力不足、军士残暴、指挥笨拙，正是这三点使他坚信中国终将胜利。

博斯哈德询问关于国共合作的前景，毛泽东提到，中国人民的团结一致高于一切，甚至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在当下都不是最重要的，国民党应该与共产党合作，一起抵抗侵略者，否则中国就没有未来，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，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忽视的。

对毛泽东的访谈持续了近三个小时，毛泽东说话简洁有力，看问题深刻透彻，他敏锐的眼光、独到的见解和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给博斯哈德留下深刻印象，毛泽东的智慧与自信让博斯哈德终生难忘。博斯哈德在采访记录稿中，评价毛泽东更像一位古典时期沉思的哲人。

博斯哈德的观察与报道，向国际社会呈现了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求真务实、廉洁自律的集体形象，以及倡导团结抗日、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主张，推动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舆论宣传战中的弱势地位。博斯哈德拍摄的影像资料，真实生动地讲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故事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，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隽永的回声。

据《学习时报》

黄永玉的“正业”

很多人都知道黄永玉个性十足的水墨画，以及他创造的猴票神话。殊不知，木刻版画才是他的“正业”。

1953年，黄永玉受邀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。在被委派到荣宝斋学艺期间，黄永玉在李可染的引荐下，拜访了齐白石，为他创作了一幅肖像木刻版画。齐白石见画后很是开心，连声夸赞：“蛮像咧！”并现场作了题跋：“齐白石像。永玉刻，又请白石老人加题，年九十四矣！”然后加盖朱文的“木人”、白文的“齐白石”和大印“梅鸟堂”。齐白石的认可，让黄永玉信心大增。不久，黄永玉迎来重要人生机遇：受外

文局的邀请，为叙事长诗《阿诗玛》创作木刻插画。

1955年，黄永玉只身来到云南路南县额冲衣村体验生活。采风期间，他认识了娴雅美丽的撒尼姑娘“普兹苇”，并邀请她做阿诗玛的原型人物模特儿。回到北京后，黄永玉精心创作出套色木刻版画《阿诗玛》。这套版画作品分为10幅，包括《阿诗玛像》《吹口弦》《织布》《射箭》《公房》《打虎》《阿诗玛在牢中》《她被水冲走了》等。作品充分诠释了撒尼人温润爽朗、崇尚自由、勤劳勇敢、坚贞不屈的民族品格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、时代感和丰富的历史文化

内涵，是美术作品对文学作品的完美表达和再次升华，是中国版画艺术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里程碑。

随后，黄永玉又创作了《春潮》《雷锋同志像》等木刻版画作品。尤其是雷锋同志像，可谓家喻户晓，却很少有人知道画作者就是黄永玉。

黄永玉说：“我一辈子本事不大，受正式教育的机会不多。过日子倒是从来不敢苟且、不敢懒惰，这都是刻木刻养成的习惯。”黄永玉秉持刻刀的虔诚和认真，才是他成功的关键。

王剑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季羨林的文学恩师董秋芳

1929年夏天，占领济南的日军撤走，旧日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改为省立高中。教高中国文的4位老师是清一色上海来的青年作家：胡也频、董秋芳、夏莱蒂和董每戡。前两位是季羨林的业师，对季羨林的影响很大。

那时候国文课本已经从文言文改为白话文，经学课被取消，作文也改为白话文，学生们感到很新鲜。董秋芳出的作文题目很特别，在黑板上大书“随便写来”，意思很明白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。季羨林从小好看闲书，后来看了大量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作品，鲁迅、胡适、周作人、郭沫若、巴金、老舍、郁达夫等人的作品几乎都读遍了。在潜移默化中，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。他认

为，写好文章，一要感情真挚、充沛，二要词句简短、优美、生动，三要布局紧凑、浑然一体，三者缺一不可。

有一次写作文，在董秋芳“随便写来”的启发下，季羨林写了一篇记述自己回故乡为父亲送葬的作文。作文簿发下来的时候，看到在每页的空白处，董老师写了不少批注，他大吃一惊。有的地方批道“一处节奏”又“一处节奏”。自己完全没有注意到的东西，老师却注意到了，而且一语道破。“知我者，董先生也！”受到董老师的鼓励，季羨林非常高兴。

在另一篇作文后面，董秋芳批道：“季羨林的作文，同理科班的王联榜一样，大概可以说是全班之冠，也是全

校之冠吧。”季羨林本来就爱好作文，受到老师如此褒奖，他的写作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，开始创作散文。他的作文《文明人的公理》和《观剧》《医学士》陆续在天津《益世报》上发表，翻译的外国作家和诗人的几篇作品也刊登在济南《国民新闻》上。作品连连见诸报章，同学们送他一个绰号：大家。

虽然后来季羨林从事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并不相关，但他对散文创作情有独钟，终生乐此不疲，最终成了一位散文名家。每忆及此，季羨林就满怀深情地说，这“全出于董老师之赐，我毕生难忘”。

崔鹤同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